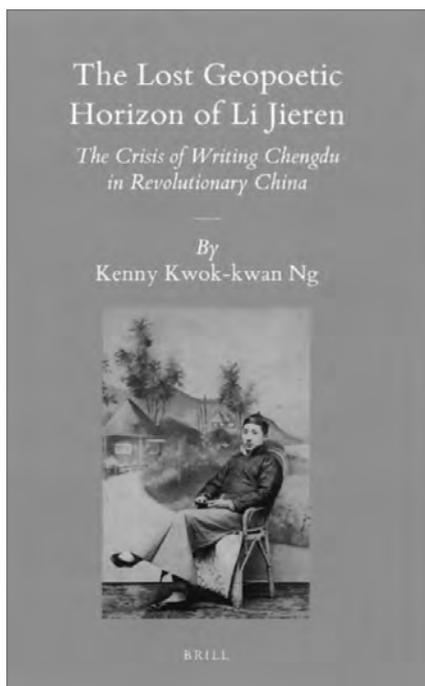


革命內外，書寫成都

——評 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 樂桓宇



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一 前言

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學乃至華語文學區域視角的研究方興未艾。相關研究以「去中國化」作為自身的核心驅動力，從中國中心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使身處時空邊緣的區域文學也浮出地表，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所在。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吳國坤的《李劫人地緣詩學的消失視界：革命中國裏書寫成都的危機》(*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以下簡稱《李劫人》，引用只註頁碼)，便是中國西南區域文學研究在英語學界的一本重要著作。之所以將之稱為區域文學是基於兩點：一是該書研究的作品、作家和地區風俗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緊密聯繫，並不可以分而論之；二是要說寫成都的風

吳國坤的《李劫人》是中國西南區域文學研究在英語學界的一本重要著作。研究像李劫人這樣的作家，必須以研究區域文學之態度來從事，若離開四川成都這個地理區域去談李劫人，便會忽略掉他的很多重要特質。

作者主要從「地緣詩學」的方法入手，研究了李劫人的「大河小說三部曲」以及其他作品，並着重分析了李劫人作品中的鄉土地方記憶和改寫舊作所產生的文學影響和背後的政治、文化意涵。

土、歷史和掌故，四川作家裏以李劫人和巴金最著。雖然巴金的小說和日記也不乏對於成都的記敘，然而在時空深度和歷史廣度上，遠不及李劫人來得深邃動情。由此可見，巴金讚歎「過去的成都都活在他〔李劫人〕筆下」^①，並非是空洞無據的溢美之詞。故此，研究像李劫人這樣的作家，必須以研究區域文學之態度來從事，若離開四川成都這個地理區域去談李劫人，便會忽略掉他的很多重要特質。

李劫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中國著名的現代小說家、法國文學翻譯家。其代表作是「大河小說三部曲」：《死水微瀾》(1936)、《暴風雨前》(1936)和《大波》(1937)，書寫了從晚清甲午戰爭始至辛亥革命為止近二十年間四川成都的歷史風雲，而其最高潮則是《大波》中濃墨重彩書寫的保路運動。然而在二十世紀50年代之後，李劫人卻因為政治等原因，對自己的小說進行了大規模改寫。

海外關於李劫人的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相比對巴金、魯迅等

人研究之豐碩，顯得黯淡不少。回顧李劫人的作品及其研究史，值得一提的僅有《死水微瀾》的英文譯本^②，以及陳小眉《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一書中對李劫人中篇小說《同情》的分析^③；夏志清對李劫人心心念念，卻並未將李劫人收入其《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孫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王德威對其也僅有短短一段文字介紹。在這些前人微弱的貢獻基礎上，作為研究李劫人的第一本英文專著，《李劫人》的出版對學界頗有意義。

二 本書的內容

《李劫人》全書共分六章，主要從「地緣詩學」的方法入手，研究了李劫人的「大河小說三部曲」



由於政治原因，李劫人在1950年代不斷改寫自己的作品。(資料圖片)

以及其他作品，並着重分析了李劫人作品中的鄉土地方記憶和改寫舊作所產生的文學影響和背後可以解讀出的政治、文化意涵。

在第一章「導言：其人其地其小說」中，吳氏向讀者說明，只有身處李劫人小說所描述的環境裏，方可切身感受到其文字之魅力。李劫人的小說類似民國時期的社會小說，描繪了地方的心靈與意識，以及當時人們對外在世界的反應與態度，頗似法國哲學家所言之心靈史 (mentalité)。同時，李劫人的小說也承載了社會和歷史空間的深沉感覺在地方的地理構形。他書寫成都的鄉土歸屬感和真實感，正如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之寫巴黎，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之寫倫敦，以及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之寫美國南方。並且，吳氏清晰地指出，李劫人深受法國「大河小說」(roman-fleuve) 影響，以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 和左拉 (Émile Zola) 《盧貢—馬卡爾家族》(*Les Rougon-Macquart*) 之手法，寫出四川的動盪史詩。

誠然，世上並無完美的作家，如吳氏指出，李劫人在其寫作中，大歷史和小民生無法相容並存，就像「大鳥吃小蟲」一樣。1950年，李劫人開始了對其作品的不斷改寫並產生焦慮。在政治和記憶之間的寫作選擇，使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然而，李劫人依然努力維持其多聲部歷史宏圖 (panorama) 的寫作、事件的隨意視角和多面向的地方記憶，並與毛澤東式的革命視角，以及隨之而來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和大規模運動的意識形態暗中

對抗。李劫人的小說填補了地方文化史的空缺，將線性的、革命的歷史視野和傳統的中國歷史語言交織、結合起來，以一種地緣記憶，構成了處於危機之中的其地、其社會的文字豐碑和紀念。

第二章「從天回鎮到成都城：地緣詩學和歷史想像」從「大河小說」的角度入手，詳細分析了李劫人「大河小說三部曲」中在地方軼事、風土風俗和歷史之外體現的詩學和美學描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死水微瀾》進行了文本細讀。李劫人的寫作是一種文化修辭 (cultural trope)，從天回鎮生發開去的歷史寫作，成為了沉澱中國鄉土的集中圖景。此章詳述了李劫人的歷史小說如何將線性的歷史敘述和想像空間化，並將遊走在虛構和現實之間的人物事件和空間地理，鉚定 (locating) 在一個流動的、全景的歷史坐標系之中。吳氏指出，李劫人的作品把民族意識的提升、小說本身史詩般的內容，以及地方的地緣詩學複雜地連接了起來。通過將歷史時間和地方性交織，《死水微瀾》中的地方話語創造了一種新的歷史小說形式；一個中國西部的邊陲小鎮，被布置成為了一個民族性的地域。

李劫人的「大河小說」的歷史敘述，如果從年鉴學派 (the Annales School) 的理論觀之，是在「長時段」中布局和描述空間，然後從微觀的角度把整個成都城市的實體囊括進去。雖然如此說來有些弔詭，但依然可以看到李劫人盼能在歷史層面取得大與小之間平衡的不懈努力——李劫人未能與國內的文學革命和進步理念接軌，卻在創作意

吳氏指出，李劫人在其寫作中，大歷史和小民生無法相容並存，就像「大鳥吃小蟲」一樣。1950年，李劫人開始了對其作品的不斷改寫並產生焦慮。在政治和記憶之間的寫作選擇，使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吳氏探討了小說家是如何使用多聲部和複視角來將創傷事件和日常生活的簡易關聯問題化，並揭示了李劫人在對抗毛澤東的革命話語的情況下掙扎着，試圖留存他多面的地方記憶。

識上與世界文學同步。前述王德威對李劫人有一段百餘字的介紹，其中提到了「大河小說三部曲」對成都日常生活鉅細無遺、富於感官的深刻描寫，形容是這座古城的虛構的民族志；同時也提到了李劫人翻譯法語小說的成就，尤其是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的《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李劫人譯為《馬丹波娃利》) ④。《李劫人》記述和分析了其翻譯活動，將《死水微瀾》和《包法利夫人》進行比較，並指出兩者在情愛結構和社會結構互動方面的相似之處，而且從《死水微瀾》中看出李劫人受到他自己在1925年翻譯的《包法利夫人》影響。但他本身帶有的具批判性的本土主義，顛覆了這種歐洲式樣的小說寫作風格，慧根自植，竟也在四川土生土長的環境中自得其洽。

第三章「美好記憶無所依：成都1911」集中講述歷史事件，即在1911年9月7日由保路運動引發的成都血案。吳氏深入研究了當小說中史地和記憶之間互相鎖合時的張力，並以成都血案切入，集中分析李劫人的小說《大波》。此章探究了《大波》於1937年寫就的早期版本，並詳細分析記憶、歷史和地方是怎樣在這部多聲部小說中互相交織的。吳氏着重從有異於現存個人回憶、新聞記錄和國外檔案的角度，去解讀事變的現場。作為一部狂歡化小說，《大波》將保路運動安置於微觀細審的視野之下，該書的地緣詩學不禁讓我們發問：地方是怎樣對現代性的運動、大歷史和地方史做出回應並進行主導的？

由此，吳氏探討了小說家是如何使用多聲部和複視角來將創傷事

件和日常生活的簡易關聯問題化，並揭示了李劫人在對抗毛澤東的革命話語的情況下掙扎着，試圖留存他多面的地方記憶。對於李劫人將保路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作對比，將攻佔成都衙門和攻佔巴士底獄作對比，吳氏讚揚了其清晰的描寫，同時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的記憶理論，特別是「借來的記憶」 (*borrowed memory*)，說明個人記憶總是埋藏在集體記憶之中。因此吳氏論述說：「多聲部小說《大波》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來承載一個地方的記憶的動態變化，在其中，讀者被引導着，看到了事件是怎麼被標記為一個充滿着角色的希望、激情和焦慮的經典時刻。」 (頁112) 在這樣的寫法下，李劫人刹停了鄉土的歷史車輪，以此對抗現代時間中的革命框架。

同時，吳氏提及法國歷史學家諾拉 (Pierre Nora) 的「記憶所繫之處」 (*sites of memory*) 理論，來說明小說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可以觀看的文化傳統和活着的記憶的構形中介。但吳氏認為，李劫人的寫作並非毫無問題：

在虛構地方的過去對抗大眾記憶和歷史書寫……當他嘗試將歷史過程以散文小說的方式戲劇化的時候，小說家總是遇到一些隨意性和暫時性的問題……他不得不面對將具有攪亂和創傷性質的地方事件情節化 (*emplotting*) 並融入一個革命的大進程的挑戰……換句話說，李劫人陷於困境的事實在於，在一個虛構的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微觀基礎和多如牛毛的微觀事件，可能並不能

順利地通往軍事行動和政治變動的宏大歷史因果闡述。(頁143)

這也是李劫人在1950年代改寫小說時遭遇巨大敘事阻力的最深層內因：微觀和宏觀的敘事互不兼容，甚至有時互相破壞。

第四章「茶碗裏的風波：地方的紀念動態」集中關注李劫人對成都各種迥然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描寫，強調小說中普通人的行為和思想對其生活世界的意義，以及他們日常的社會實踐。此章論述了李劫人微觀敘述的美學手法，分析其藝術直覺，以及運用獨特的形式構造來處理歷史多重層面的經驗。吳氏認為，李劫人通過大量描寫社會細節來凸顯真實的歷史的文學風格，是源於其自然主義信條和對地緣詩學的興趣。作為一個歷史小說家，李劫人扮演了歷史學家和小說家的雙重角色。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挑戰在於如何重現重大事件：把故事講得既有歷史的廣度和複雜度，又有地方的世俗性和親切感。

吳氏以《暴風雨前》為中心，將「大河小說三部曲」中敘述的一些重要事件進行了詳細分析，比如清末四川反洋教運動中眾人圍攻教堂，以及1902年紅燈教起義中民眾圍觀廖觀音被處死。這些排外主義大歷史下的標誌性事件作為地域社會記憶，在李劫人的本土敘述中被重新恢復。吳氏認為「敘述者刻意而有策略地加進了一些物理上的實體，作為真實生活的對照物，來創造一種真實感」(頁159)，同時引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理論，認為描述一些不甚相關的細節是在

現實主義小說裏強調真實性的一種必要方式。吳氏在論述李劫人小說中民眾的從眾性時，對魯迅對看客的論述有了新的見解。他認為，李劫人雖然繼承了魯迅對革命的懷疑，然而，與魯迅筆下描畫無聲沉默的看客不同，李劫人進一步描寫了看客的內心，比如廖觀音被處死時，圍觀群眾的獵奇和肉欲。吳氏認為，李劫人的小說是反歷史的證詞。小說家鐫刻地方事件記憶的方式，不是根據歷史的因果關係，而是根據角色所理解的在當地發生的一系列隨機事件。吳氏因此質詢：小說家為甚麼以及如何能改寫這些地方歷史事件，使之成為詭異奇觀和陌生體驗？

第五章「愛在革命蔓延時」討論了李劫人對《大波》的重寫，論述了地方和國家在政治方面的限制，以及意識形態的範式如何對其寫作產生干擾。即使作為一個歷史小說家，李劫人也不得不在敘事的縫隙中掙扎，演練他自由的想像。李劫人將他的小說轉化為私人記憶的中介，同時也弔詭地改造成歷史的公共場。吳氏分析了《大波》中私人情愛的細節，並將其放置回歷史的宏觀背景中去研究。特別對小說中黃太太、楚子材等人關於情愛和情話的描寫的分析，深得四川地方語言文化的精髓。同時，吳氏將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寫作與李劫人的歷史寫作對比，揭示了兩者之間的相同點，即社會肌理中人情世故的跌宕起伏。

就文學的地形學(topography)而言，《大波》所描寫的關於成都的地緣詩學之記憶，與歷史上變動不

作為一個歷史小說家，李劫人扮演了歷史學家和小說家的雙重角色。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挑戰在於如何重現重大事件：把故事講得既有歷史的廣度和複雜度，又有地方的世俗性和親切感。

《大波》所描寫的關於成都的地緣詩學之記憶，與歷史上變動不居的、不斷發展的革命進程具有明顯差異。李劫人的小說是對1930年代「革命加戀愛」這種文化政治和文學實踐模式的另一種回應，強調了現代主體性和國家的集體奉獻之間的衝突。

居的、不斷發展的革命進程具有明顯差異。李劫人的小說是對1930年代「革命加戀愛」^⑥這種文化政治和文學實踐模式的另一種回應，強調了現代主體性和國家的集體奉獻之間的衝突。在《大波》中，李劫人讓敘述呈現一種持續的對當下時刻的不確定性，以此重新捕捉人物對突發事件不由自主的反應，從而營造一種真實感。吳氏總結說：「激烈的關於女性的感性描寫和性愛的表達，應該受到控制或規範，因為它們很可能挑戰了新中國宏大的革命敘事。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小說家的重寫體現了他對重新塑造和再生其筆下人物的嚴肅努力，使得這些人物從一部小說中歷史進程的消極的旁觀者，轉化成為積極的參與者。」（頁202）

在上一章的論述基礎上，第六章「通向永滅之路」則更為深入地探討了李劫人這種重寫的努力是否成功，即這些人物角色在藝術和意識形態上的處理是否變得更合乎情理。吳氏先從丁玲對《死水微瀾》的評價入手，從她大加讚賞李劫人的寫作手法，卻不能認同其反英雄的人物塑造和故事中反映的意識形態，引出了李劫人的小說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齟齬：小說的私人書寫和國家的宏大敘事之不可兼容。不過，「李劫人的歷史實驗值得我們注意，並不是因為它對歷史的外顯處理和政治分析，卻是因為他在小說中表現出小說形式和國家歷史的表徵之間無法解決的張力」（頁213）。小說的地緣詩學揭示，歷史的進化囊括了多個在特定地點並行不悖的社會進程和運動，

並且在這些地點被不同的個體以不同的方式所感受到。書中提到，在李劫人晚年改寫其小說的時候，自感力不從心，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時間，精力和記憶也已經大不如前。如此的續寫便是一種悲劇——有還原整個歷史的理想，卻如西西弗斯(Sisyphus)推石上山，永遠達不到理想的高度。

更可惜的是，李劫人又太在乎讀者的議論，有些時候甚至為讀者對歷史小說真實性和虛幻性之間的藝術平衡的理解所干擾，因此墮入了歷史真實與虛構的無限掙扎。吳氏詳細分析了新舊兩個版本的《大波》之間的區別，最終的結論是，《大波》的修改變成了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李劫人把自己打敗了。雖然李劫人對歷史作了詳細研究，將很多創傷的事件情節化，但事實上，李劫人描寫的是「沒有未來的另類過去」(alternative pasts with no future)。這一章特別分析了新版《大波》(1963)中，李劫人着力重塑歷史人物端方之死。作為一個「老無所依」之地，四川無論對端方還是對晚年的李劫人來說，都最終成為了一個不祥之地。此章最後總結道，與給出歷史事件解釋和意識形態因果關係的歷史小說慣性不同，李劫人的歷史小說編寫了一個足以造成革命「解構」的畫卷。或許李劫人的小說書寫本身，也是對他自己歷史處境的預言式評價吧。

在結論「無法言喻的結局」中，吳氏以德國作家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的理論來證明大歷史和小敘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可能存在的問題。然而，「李劫人試圖將

歷史編織進日常生活的織理——日常事務、無關重要的細節以及偶然的相遇。歷史偷偷鑽進小說角色世俗的私人世界，並且以這樣的方式創造了戲劇的張力，在這張力之中，個體的命運與廣泛的歷史力量相互糾纏。……他從未放棄嘗試創造一部歷史宏圖的小說，去囊括大歷史的進程，同時也恢復地方歷史的微觀現實」(頁250)。由此，吳氏提出：在何種程度上，李劫人能夠把記憶的敘述融入歷史之中？吳氏認為，重寫《大波》至少不應全部通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稜鏡分析。不過，正是政治記憶和地方詩學，促使歷史小說家李劫人在1950到1960年間不斷重寫《大波》。而不斷重寫也使得李劫人的作品集成了開放文本，持續引出新問題，也吸引讀者不斷地閱讀和闡釋。與毛澤東歷史觀的目的論不同，在李劫人的作品中，歷史不是被理解為個人努力奮鬥的目的和結果，而是一種客觀的外界存在事實，即事情本來的面目。

在這部專著中，地方作為地緣詩學的特殊地點，也作為臨時的人文延伸，與共同記憶密不可分。吳氏把李劫人看做「一個講故事的人，他提供了另一種歷史小說的形式，即一地之記憶的微觀歷史之構形，與記憶的霸權政治正好相對，然而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通過政治、道德和美學範式的逐漸轉移，漸次確立了這種霸權政治話語的權威，以此壓倒了地方的敘事」(頁258)。在這種對抗之中，李劫人遭遇了自己的寫作危機，最終也成為了歷史上無法歸類的異見

者。但不論如何，他成為了寫作的英雄。他不僅在小說中將記憶歷史化，小說本身也成了記憶的所繫之處。此書的結尾發人深思：

對於李劫人來說，歷史是否一個夢魘？抑或，僅僅是一個他永遠無法從中醒來的夢境？以元歷史的諷刺及我們的後見之明，李劫人的重寫證明了重塑過去和改變預料中的結局，並不會太多地違背歷史聖潔文本的真理價值。因為歷史文本培育了小說的能力，使之能生成、進化，或者是回應——時間使得可能性因此被確立，宣告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同時，擊敗歷史必然性的觀念，救贖失掉的未來。(頁260-61)

三 本書的開創與潛力

《李劫人》立論精當，材料豐富，開創性自然是不容置喙。李劫人的小說在英語學界第一次被研究者細讀並寫成專著，不僅對區域文學和歷史研究大有裨益，對於當下世界或許也具有啟示意義：雖然在最近三十年來，全球化、跨國化的形勢愈益明顯，社會邊界已經很大程度開放，但是李劫人所關注的「地域」作為地方身份和文化真實性所綁定的地點，或者說「區域」作為國家身份整體的換喻，依然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無法忽略暗中湧動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即是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重建高牆的復辟趨勢。在此背景下，研究區域文學意義深遠。地方可以

正是政治記憶和地方詩學，促使歷史小說家李劫人不斷重寫《大波》。這也使得李劫人的作品集成了開放文本，持續引出新問題，也吸引讀者不斷地閱讀和闡釋。

李劫人作品的文學和詩學價值，不僅僅在於歷史化，其文學和語言細節也不容忽視。李劫人的小說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於其靈活跳脫的四川方言之魅力。如能專門開闢一章講述李劫人著作中的四川方言，必然深具意義。

被看作充滿鬥爭和焦慮、僵持和變動、承繼和斷裂的不穩定領域，特別是當地方受到各種負面的外力影響時，也會掙扎着去尋找新的身份和意義。此書重審了李劫人的作品，也更好地闡明了當下「地方的誘惑」(lure of the local) 為何物。

此書抓住了李劫人寫作的主要特點：在地理風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學。所謂「地緣詩學」，「不僅指出了過去的人們生活在某一地而萌生的空間觀念，而且也反映出某一時基於共同的自然、文化、地理和歷史環境，通過曝光生活經驗和記憶而創造出的公共身份認同(communal identity)。此種以空間為本的詩學，強調讀者對回憶的遺忘和回憶之間互相衝突的掙扎經驗」(頁12-13)。李劫人的歷史小說，是在地緣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詩性寫作方式的成果，體現了文學的在地性。在現代中國文學中歷史、小說、記憶和地方互文的指涉過程裏，吳氏把李劫人的全部虛構作品，當做一種跨文類的、不斷生長的地緣詩學的記憶作品，當做一種在充滿危機的社會中、在特定地點的文本豐碑來分析，同時也發現了李劫人許多特點，多發前人所未發。例如，李劫人對於生活本身細緻入微的描摹，與其在法國留學時深受自然主義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吳氏特別提到在李劫人作品的字裏行間，對福樓拜的寫實主義和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非常明顯的借鑒和受影響的痕迹。

筆者作為一位成都人，對於《李劫人》一書出版，自然是欣喜之至。書中深入淺出地講述四川的故

事，即使不熟悉西南歷史的讀者也能讀得饒有興味。此書最重要的特點是得益於海外自由的學風，揚棄了國內文學研究的政治禁忌，完全不從意識形態來分析李劫人的作品，而把歷史學、文學、社會學的理论融為一爐，也引領了海外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最新的理論和動向。吳氏拋棄了中國大陸傳統的政治化的文藝理論批評方法，特別是毛澤東的文學不斷進步的目的論；同時也質疑了我們有關區域/國家、鄉村/城市、邊緣/中心等雙極概念，以此重新審視身處邊緣區域的李劫人，以及其可稱詩史的經典。

也許是吹毛求疵，筆者認為李劫人作品的文學和詩學價值，不僅僅在於歷史化，其文學和語言細節也不容忽視。李劫人的小說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於其靈活跳脫的四川方言之魅力，值得在語言文字上研究一番。雖然吳氏對成都方言的掌握能力令人歎服，即使是李劫人著作中十分生僻的四川方言，他也能翻譯成信達雅的英文，但是此書卻沒有關於地方文學語言的進一步分析，令人稍感遺憾。李劫人之用川語寫作，正如《海上花列傳》作者韓邦慶之用滬語，雖然為閱讀設立了門檻(然川語並無滬語般複雜，較為輕鬆易讀)，但是對當地歷史和文化的還原頗有助益。實際上，以四川的文學語言為研究對象的著作，中外皆有。且志宇在2015年寫了《四川方言與文化》一書，對四川方言文學多有闡釋，比如，他講到《死水微瀾》中顧天成進城之後被「燙毛子」。李劫人解釋說，這是「用開水將豬毛燙去，即是整

豬的意思」。且氏便對這句話做了詳細的解釋，頗具趣味^⑥。耿德華 (Edward M. Gunn) 亦在《表現地方：當代中國媒體中的方言》(*Rendering the Regional: 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一書中，提到重慶、成都方言的文學和社會作用^⑦。所以筆者認為，方言文學這個方向依然是李劫人研究的潛力所在。如果此書能夠專門開闢一章講述李劫人著作中的四川方言，必然深具意義。

四 結語

總而言之，《李劫人》帶給讀者的意義在於，其一，通過對中法文學之比較，以及在中國文學的整個場域中，特別是與魯迅、巴金等人的比較，李劫人作品的位置得到更清晰的釐定和被前所未有地深度理解。其二，正如吳氏在書中向我們反覆揭示的，雖說李劫人的小說是一種與史相異的見證，但卻又在見證和想像之間取得了精妙的平衡。與一些小說（如美國作家狄克 [Philip K. Dick] 的《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大肆篡改歷史以追尋另一種詩性真實不同，從吳氏的論述中我們意識到，李劫人的小說盡量忠實於歷史的細節，卻依然可以在歷史中看見無限的可能，從日常生活中看到背景裏歷史洪流的暗湧。李劫人書寫成都，傾注一生，筆下的故事發生在轟轟烈烈的革命之內，而敘事聲音和反思意識又游離於革命之外。這中間難以言說的平衡和張力，就是

此書向我們揭示出的李劫人作品的無盡魅力。

註釋

① 參見唐金海、張曉雲：《巴金的一個世紀》（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頁456。

② 目前《死水微瀾》有兩種英譯本，分別是Li Jieren,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90); *Ripple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 trans. Bret Sparling and Yin Chi (Portland, ME: MerwinAsia, 2014)。

③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Lanham, MD: Rowman&Littlefield, 2003), 147-50.

④ 王德威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對李劫人的介紹，參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1。

⑤ 這種「革命加戀愛」的小說類型 (genre) 在劉劍梅的專著中有相關的詳細論述。參見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⑥ 參見且志宇：《四川方言與文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5），頁291-93。

⑦ Edward M. Gunn, *Rendering the Regional: 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144-53.

李劫人書寫成都，傾注一生，筆下的故事發生在轟轟烈烈的革命之內，而敘事聲音和反思意識又游離於革命之外。這中間難以言說的平衡和張力，就是李劫人作品的魅力。

樂桓宇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哲學碩士研究生